

美国左翼女性文学的乌托邦构想

——基于勒苏尔《姑娘》的探讨

张 莉 袁 洋

(郑州大学 英美文学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 450001; 郑州大学 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美国左翼女性文学表达了左翼写作中女性的独特经验、视角和声音,体现了 20 世纪社会各阶层女性对自我所处的物质环境、精神环境、生态环境等的观察和思考。不同时期的左翼女性文学虽聚焦不同话题,却始终坚持对建构以“姐妹情谊”为纽带与特征的女性共同体的追求。美国左翼女作家勒苏尔在其代表作《姑娘》中,就通过建立女性共同体的形式,帮助主人公“姑娘”完成了成长的仪式:母亲帮助“姑娘”完成了成为女人道路上的初步启蒙,对母亲的历史记忆为“姑娘”提供了复写的可能和前行的勇气。克莱拉是“姑娘”成长道路上的同路人,她不但是“姑娘”悲苦生活中的依靠和寄托,也通过镜像效果扩展和深化了“姑娘”对自我和社会的认识。阿米莉娅充当了导师的作用,引导“姑娘”走进女性共同体,实现了性别和阶级意识的觉醒。可以说,以“姐妹情谊”为基础缔结的女性共同体是女作家构想的实现自我解放的有效路径,然而,这样的纯粹女性乌托邦不可避免地具有脆弱性、短暂性和不确定性,在现实中往往沦为脱离实际的空想。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的左翼女性文学中,姐妹情谊这一女性命运共同体形式遭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构,体现了女性作家对这一乌托邦构想的深入思考。

关键词:勒苏尔《姑娘》;女性共同体;乌托邦;姐妹情谊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21)01-0085-06

美国左翼文学是 20 世纪美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文学社会批判传统的继承和延续。在美国左翼文学研究中,女作家的活动和创作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实际上,女性作家不但积极参与了美国左翼文化运动,而且书写和改变了无产阶级小说和现实主义小说的男性传统。美国左翼女性文学在 20 世纪美国左翼运动与女性运动的合力之下产生,它反映了左翼写作中女性的经验、视角和声音,表达了女性对贫困、歧视、战争、暴力、隔离、孤独、迷茫、恐怖事件、全球危机等物质的、精神的、个性的、共性的问题所进行的思考,体现出 20 世纪社会各阶层女性对自我所处的物质环境、精神环境、生态环境等的观察和感知。依照作品主题的不同,参照美国左翼运动发展阶段的划分,美国左翼女性文学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期:20 世纪 30-40 年代以性别和社会阶层意识的觉醒为特征的旧左翼时期;60 年代以文化和审美转向为特征的新左翼时期;90 年代后以反思和重建为特征的当代左

翼时期。”[1](P37) 旧左翼女性文学以反抗和对立的姿态呼吁政治权利和性别平等。新左翼女性写作深受女性主义运动和种种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体现出向文化和美学转向的特点。当代左翼女性文学更加多元和开放,理论建构和传统挖掘成为其两大鲜明特点。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时期的左翼女性文学虽聚焦不同的话题,却始终没有放弃对以“姐妹情谊”为特征的女性共同体的追求。由“姐妹情谊”缔结的女性共同体具有乌托邦的性质,表达了女性同胞对社会处境的思考和反抗,纯粹的女性乌托邦成了她们抱团取暖的场域,是女作家构想的实现阶级和性别解放的有效路径,因此也成为我们理解美国左翼女性文学的突破口。本文以美国左翼女作家勒苏尔的代表作《姑娘》为例,探究“姐妹情谊”背后所导向的女性乌托邦的力量,并审视与思考女性乌托邦在政治实践背景下的现实特征。

一、成长的实现《姑娘》中的女性共同体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美国国内女性的作用凸显,

收稿日期:2020-10-01

作者简介:张莉(1977-),女,河南许昌人,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袁洋(1992-),女,河南商丘人,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人文社科类)支持计划“英美左翼文学研究”(项目编号:2019-CX-002);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美国纽约知识分子群女作家研究”(项目编号:2020BWX024);郑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青年科研团队培育计划资助(项目编号:2020QNTD-03)。

各种专门的妇女组织、妇女刊物诞生,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在各个领域担任领导角色。美国共产党也认识到女性问题是重要的政治问题,因而及时调整了自己的战略,开始越来越重视女性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作用。在此环境下,形成了美国左翼女性文学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旧左翼女性文学时期。国内学者王予霞教授把美国左翼女性文学分为无产阶级女性文学和左翼知识女性文学两种类型。其中无产阶级女性文学指的是“在美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中产生的,主要由女作家创作,描写无产阶级妇女生活,塑造劳动阶级妇女形象的文学作品,特别关注阶级斗争中的性别冲突”[2](P147)。无产阶级女性文学是美国旧左翼女性文学的重要成就。许多左翼女作家以自传或者写实的形式书写独特的女性经历,批判男权中心主义思想,关注女性政治权利。“姐妹情谊”往往成为这些女作家斗争的武器,也成为旧左翼无产阶级女性文学的重要主题。“姐妹情谊”源于女性主义运动,它与男权主义相对,既是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中一个重要概念,也是美国左翼女性文学试图建构“女性共同体”的一个重要表征。“这一概念强调女性自我救赎的能动性,指女性为了实现完整的精神自我,寻求一种相互的体认、自我发现的激情,并由此建立一种稳定的情感纽带”[3](P33)。它是“广大女性抑制‘菲勒斯’价值中心,坚守性别自我,寻求女性解放的重要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为身处‘第二性’地位的女性抵抗父权提供了精神援助和理论支持”[4](P91)。从旧左翼女性文学的角度来看,很多关于女性成长题材的创作都提供了关于“姐妹情谊”的思考与书写。

马瑞戴尔·勒苏尔是美国共产党员,旧左翼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家,是1935年在美国作家联盟会议上发言的唯一女性代表,也是当年委员会16人常务代表中唯一的女性。1937年,在作家联盟会议的闭幕式上,勒苏尔同马尔科姆·考利、厄普顿·辛克莱、兰斯顿·休斯、厄内斯特·海明威等人一起当选为作家联盟副主席[5](P79-81)。40-50年代,勒苏尔受到FBI的询问和监视,生活困苦,其文学创作也渐渐被人淡忘。70年代以后,勒苏尔的声誉逐渐上升,她开始被视为美国左翼运动和女性运动的先驱和重要代表人物,被尊称为“圣·马瑞戴尔”。勒苏尔的作品关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性,用悲悯的笔触书写大萧条时期无产阶级女性的生活。

小说《姑娘》是勒苏尔的代表作,也是旧左翼女性文学的经典之作。小说的主人公是被大家称之为“姑娘”的一家非法小酒馆的女招待。小说描述她在背井离乡来到大城市之后短短几个月的生活,呈现了她在周围女性同胞的影响之下实现性别和阶级意识觉醒的过程。《姑娘》直面贫穷、饥饿、社会运动、暴力行为以及妓女、堕胎等禁忌性话题,又有明显的社会主义政治

色彩,这部完成于1939年的以大萧条为背景的作品一度被列为禁书,直至1978年修改过的版本才由西部出版社正式出版。

《姑娘》是一部典型的无产阶级女性成长小说,书写“女性共同体”的抵抗信念,倡导“姐妹情谊”的精神力量,比较完整地体现了“姑娘”的“女性成长”的历程。女性成长小说除了与成长小说有共同的领路人模式外,还兼具性别特质。“女性成长小说是以生理上或精神上未成熟的女性为成长主人公,表现了处于‘他者’境遇中的女性,在服从或抵制父权制强塑的性别气质与性别角色的过程中,艰难建构性别自我的成长历程,其价值内涵指向女性的主体性生成,即成长为一个经济与精神独立自主的女人”[6](P55)。小说的主人公“姑娘”的成长,不仅体现在她由懵懂无知的乡下姑娘变成勇敢坚毅的母亲这一身份变化,更体现在她在这一过程中阶级意识和性别意识的觉醒,体现在她对自己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的认识的深化和她靠近集体、融入集体去进行反抗的行为,而这些转变,是由包括母亲和女性好友在内的几乎清一色的女性共同体引导和促成的。

(一) 母亲的影响 “女性历史性”的书写

孩子与母亲之间的联系是天然的、原始的,血浓于水的亲情关系是不可磨灭的印记。而在母亲与女儿之间,同为女人的身份又让她们多了一条链接和联系。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母亲既是母亲,也是陪伴她成长、传授她经验的“姐妹”,无形中成为女儿成长的榜样和模板。母亲的影响根深蒂固,她对女儿的生活选择发挥着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固化在女儿的记忆中,使得母亲在女儿成长的道路上成为无所不在的存在。莱斯利·拉比纳曾提出“女性历史性”[7](P401)的概念,以女性渴望追求与骑士的浪漫爱情为例,指出女性的生命轨迹总是通过记忆实现对前人女性活动的复写。滕尼斯也有类似的提法,他认为“孩子通过自身,纯粹依靠记忆来滋养自己,尽管遥隔天涯,相距万里,都能感到或臆想到近在咫尺,在一起活动”[8](P66)。小说中的女孩每当遭遇困苦时,她与母亲的沟通、她对母亲的记忆往往成为一种可以依赖的力量,无形中给了她指引。母亲的影响与母亲的形象构成了一种“女性共同体”,在“姑娘”向姐妹情谊迈进的路途中成为女性成长中一只无形之“手”,赋予了“姑娘”渴望与追求爱情的精神信念。

女孩对于初恋,既憧憬又恐惧。第一次与布奇接吻,她内心惶恐不安,此时出现在脑海的是“哦,妈妈,我该怎么办?你给我说过这很危险。我很害怕,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9](P29)母亲的告诫就这样无意识地出现在女孩的脑海中。她回家参加父亲葬礼时,借机要求母亲讲述更多与父亲的事情,希望从中能找到如何处理这段关系、如何控制自己欲望的答案。但

母亲并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没有人能告诉你任何事情,你必须和它(欲望)共存,有时候燃起欲望而有时候又要使它消亡,它就存在你的身体里,你总是会知道的。”[9](P43)母亲的这段话让女孩反思,当她再次回到工作的地方后,她觉得自己变得不同了,“第一次感觉到自己进入了母亲的生活,她不敢说自己不再恐惧欲望,但知道自己必须跨越,成为像母亲一样的人”[8](P45)。第一次有了性生活后,她感觉非常糟糕,此时的她更多的是回想母亲与父亲,觉得布奇像父亲一样对待自己,自己也感觉到“我成为了母亲”[9](P52)。银行抢劫失败后,所有的男性都死去或者被抓,女孩和她的姐妹们沦落到救济所生活。救济所的女孩们都把对母亲的历史记忆铭记于心,这给予了她们活下去的勇气。小说最后,在克莱拉奄奄一息时,女人们安慰道“我们必须记住,回忆是我们拥有的一切,我们必须记住。记住母亲的胸怀,哦,妈妈帮助我们吧!克莱拉想想自己的母亲……”[9](P142)女儿出生后,女人们疾呼:“这是一个女人,姐妹和女儿。”“我看见妈妈在我们之中,跟我们忍受着同样的苦难……”[9](P148)此时,女儿和母亲的角色重合成为了姐妹,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女性共同体”。由此,“姑娘”将“女性共同体”的精神信念内化到自己的意识中,从而按照“母亲”的形象踏上自我奋斗与自我确认之旅。

“姑娘”升级为母亲,从而圆满地成为女人,她的这种复制性行为就是“女性历史性”的体现。母亲的言说和对母亲的记忆让“姑娘”觉醒,也赋予了她去迎接困难的勇气,是女孩建构自我独立意识的重要开端。小说结局中,“姑娘”又生了个女孩,最后出生的女孩更是承载着母亲的愿望和寄托。她是具体的存在,也有抽象的内涵。女儿的出生不仅象征着希望,同时也代表着女性命运的轮回和圆满。女儿作为女性角色的传递纽带,把女孩、母亲以及身边的姐妹们联系了起来。毋庸置疑,“姑娘”的女性成长历程,就是“女性共同体”不断突显、不断丰盈、不断成长的历程。

(二) 同伴的陪同:镜像中的认知

除了母女关系的纽带,小说中的姐妹情谊还突出表现在“姑娘”身边同伴、好友的陪伴,她们是“姑娘”成长道路上的同路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每个人的成长都会受到一些人的影响,这些人从正、反两方面丰富着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和对社会的认知。在观察这些人扮演的社会角色过程中,青少年逐渐确立起自己的角色和生活方向。充当正面引路人的其中一种就是伙伴式的人物”[10](P125-126)。包括克莱拉、贝尔等在内的同路人不仅是“姑娘”孤苦生活里的唯一依靠,是温暖和力量的源泉,她们同时发挥着“镜子”的功能,从她们各自的悲惨遭遇中,女孩照出了自己的命运,照出了她们所遭遇问题的根源。

初到小酒馆的女孩,懵懵懂懂,面对陌生的恶劣的

环境,充满惶恐,幸好有克莱拉这样的好友替她答疑解惑、帮她摆脱窘境。虽然克莱拉地位低下,甚至最终沦为妓女,但她依然坚强乐观地面对人生,她总是给予姑娘力所能及的爱与照顾。克莱拉鼓励姑娘勇敢追求自己的理想,“孩子,你会得到自己向往的一切东西,只要你坚持自己的信仰并一直努力下去”[9](P1)。她引导姑娘正确对待爱情,“爱给不了承诺。世上有很多路走向不同的地方,而爱只会出现在路的尽头”[9](P10)。她帮助姑娘应付客人的纠缠,尽力保护她。姑娘和克莱拉之间的姐妹情谊是一种胜似亲情的依存关系,她们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彼此照应,相互鼓励,携手追寻渴望的生活。女孩也在克莱拉的引领下一步步走向成熟,开始拥有独立的女性主体意识。

姑娘的成熟也体现在她在克莱拉患病之后自觉转变了角色,从被照顾者变成了照顾克莱拉的贴心姐妹。在克莱拉被强制拖去接受了电击治疗后,姑娘抱着已丧失意识的克莱拉说“不要哭,我们一起受难,我们是女人,什么都不会使我们分开。”[9](P140)克莱拉最终凄惨离世,姑娘将刚出生的女儿命名为克莱拉,以此追悼自己的姐妹。

克莱拉的苦难在姑娘的身边上演,促使其去思考像克莱拉和她这样的女人,何以遭受如此厄运。从克莱拉的境遇可以看出,身处男权社会中的女性,似乎成为了男性的附属品,女性的自我价值要通过男性才得以实现。然而,作者试图打破女性依附男性才能自我实现的僵局,小说的后半部分,克莱拉最终回归女性群体,并与姑娘一起面对悲凉的世界。从此意义上来看,克莱拉仿佛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姑娘不但照出了她自己,也照出了底层社会女性群体的恶劣生存状况及根源所在,这些都是促使姑娘的性别与阶级意识觉醒的重要因素。在镜像中,姑娘找到了真正的自我。由此,姑娘和克莱拉的身份融为一体,她们之间的关系也不仅仅是一对姐妹,更是女性整体的社会表征,是那个时代女性的镜像。

(三) 领路人的指引:共同体的建构

“姐妹情谊”中的“领路人”也是“姑娘”作为女性成长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成为《姑娘》中浓墨重彩书写的一条主题。除了母亲的启蒙、同伴的影响,姑娘成长过程中的直接诱因是阿米莉亚及其代表的女性共同体对她的指引。阿米莉亚是积极的工会成员和工会运动的宣传者,与“姑娘”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女性同盟力量,这就从侧面勾勒出“姑娘”艰难的心灵成长,展现出女性之间的紧密关系。女性共同体加强了她的们的力量,带动了“姑娘”在身心上的渐进成长。例如,从姑娘来到酒馆开始,阿米莉亚就对她进行了精神的启蒙“Amelia说每个人都很重要,我觉得她就像妈妈,她们都担负了很多,抵抗了很多,忍耐了很多。”[9](P3)在经历了银行抢劫案的失败后,妇女们不但失去了男

人,也被迫离开她们赖以谋生的酒馆,住到了环境恶劣的救济所。在这里,阿米莉亚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她积极奔走,为孕妇们寻求补品。她倡导大家团结起来为权利抗争到底,“我们必须活下去,不要倒下,努力抗争。我们要同时成为男人和女人,憧憬一切并为之奋斗”[9](P125)。阿米莉亚逐渐成为女孩的精神依靠。她被哄骗在同意做绝育手术的表上签了字,一个聋哑姑娘向她传递了这样的信念:“不要哭,我们这些人,在一起受难。”[9](P133)这句话让女孩想起了阿米莉亚,她悄悄写下阿米莉亚的名字,这一简单举动仿佛瞬间让她获得了力量。阿米莉亚变成了一种信仰,给女孩活下去的希望同时激发了她的觉醒意识。

阿米莉亚引导女人们意识到女性群体的反抗所蕴含的力量。在她的影响下,这些穷困的女人们越来越团结,在女孩最无助的时候女人们竞相用讲述自身经历的方法来鼓舞她。《姑娘》最后一章的中间部分每段的开头相似,“克莱拉说,贝尔说,阿米莉亚说,克莱拉说……”[9](P112)这种多重声部重合的现象是女性群体相互帮助、抱团取暖的体现。

女同胞们的情绪终于在克莱拉去世之后爆发。阿米莉亚倡导大家为克莱拉的死举行抗议活动,让整个城市都听到她们的声音。“她(克莱拉)是一个罪犯吗?她是恐怖人物吗?她身无分文……谁杀死了克莱拉?谁要杀死我们?”[9](P146)屋外女性同胞们的抗议与此时屋内新生儿的啼哭声相互照应,象征了女性力量的崛起和承继。以姐妹情谊为基础建构的女性共同体屏蔽了男权社会中男性的声音,“试图依靠女人之间的情意组构一个强大的屏障,让女人不再受到男权社会的侵蚀与伤害,构筑出一个理想的‘女儿国’”[11](P71)。女人们在抗议活动中传递了她们声音,让女性成长的力量获得了一种认同,女性共同体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确立、保护和延续。

二、乌托邦的憧憬 “姐妹情谊”的力量

马瑞戴尔·勒苏尔的《姑娘》不仅建构了女性成长的“共同体”,而且传递了“姐妹情谊”的力量。“姑娘”在现实中的成长,从深层次映射出女性成长的一种乌托邦式的憧憬。正如小说的标题所示,《姑娘》是一本女孩(们)的书,“姐妹情谊”的力量就像茫茫大海里的一束光线,始终给予“姑娘”在成长历程中一种希望与信念。小说的题记摘录了《旧约·耶利米书》的最后两行诗句“压迫者的存在致土地荒凉,姐妹们的苦痛让我心悲伤。”这一引用直接点明了小说的主题,对女性所受压迫的揭露,对她们的苦难经历所给予的同情。更重要的是,小说给出了实现女性解放的道路,那就是依靠女性集体的力量进行反抗,并把这一反抗的精神通过母女关系的纽带、姐妹的纽带延续下去。正如《姑娘》后记所言“这是我们母亲一代的故事。它也是我们的故事。这是一扇窗户,透过窗我们能看到我们的

祖母们、曾祖母们……”[9]

女孩的成长依赖姐妹情谊,姐妹情谊是广大底层女性的物质和精神保证。就如同在社会生产力极为落后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在极大程度上依靠血缘、地缘等的联系组成共同体才能共同应对艰苦的环境从而生存下来一样,姐妹情谊类似一种血缘联系,女性同胞们同呼吸、共命运,结成了深厚的友谊,这一情感纽带促使她们建立自己的女性共同体。“姐妹情谊是女性主义的理论和批评的基本原则,也是女性文学乐于建构的理想国,它的动因在于女性作家、批评家争取女性团结以获得力量的愿望,也基于女性四分五裂而无力反抗压迫的实际”[12](P89)。依据姐妹情谊而构建的女性共同体兼有了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的功能,既构建了强大的联盟以对抗外在的危险与压迫,又提供了联系和交往的平台,使反抗、游行、示威等活动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投入到这女性共同体的怀抱中,许多在现实中迷惘孤独的女性找到了归属感、安全感和确定性。

姐妹情谊是“女性理念和体验的联结,以及在以女性为中心的视野中对自我的肯定和身份认同”[13](P131),这一术语并不是女性运动第二次浪潮的产物。事实上,19世纪的美国社会,工业化生产已经开始,男人们纷纷逃离家园去城市工作,而女性同胞们主要的生活场域就是家庭,社会场域是教会。这种男女生活场域的分离促使妇女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妇女的领域使美国妇女产生了一种性别认同感,或称姐妹情谊。妇女把个人的遭遇同全体妇女的命运联系起来,认识到妇女作为一个以性别划分的阶级受到社会的不公正待遇,同时,她们又看到妇女整体的社会力量,从而组织起来为改变全体妇女的命运而斗争”[14](P12)。不管姐妹情谊的缔结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还是一种政治号召,都为女性群体的出路做出了积极探索。

20世纪初,“姐妹情谊”逐渐发展成为女性主义运动一个重要的政治术语。美国女权主义运动领袖夏洛特·铂金斯·基尔曼在小说《霍兰德》中,构建了一个纯粹女性共同体。那里生活着清一色的女性,她们过着群居生活,她们强壮、自立、生活融洽和谐,她们以女性价值观来管理和认识事物,倡导姐妹情谊,以非暴力的形式来解决争端和纠纷。显然,“霍兰德”的构建是为了抗衡现实社会中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体制,表达的是一种激进的文化女权主义倾向。这一激进传统在20世纪50至70年代得到延续和发展,一群激进女权主义者联合起来创立了女同性恋主义,成为当时女权主义运动的重要分支。其中,女权主义者凯西·萨拉查尔提出了“姐妹情谊就是力量”的口号,倡导开展以姐妹情谊为基础、以妇女问题为中心的独立妇女运动,反映了激进女权主义者的一个基本观点“不论阶级、种族、宗教上有多少差异,妇女可以由她们作为女人的

共同经历连结起来,女权主义应促进、巩固这种姐妹情谊,从而形成强大的女权权利集团,以便推翻男性统治。”[14](P126-127)

美国女权主义诗人艾德里安娜·里奇对激进女权主义者提出的姐妹情谊持肯定态度,她认为“这种性别路线不仅是女权主义的组织原则,而且是把每一个妇女从家庭和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的号召,是促使妇女形成社会群体的姊妹情谊”[15](P4)。里奇在认同姐妹情谊的基础上扩大了“同性恋”的含义,提出了“同性恋绵延”的概念,她指出,同性恋不仅由临床上界定,还包括“更多形式的妇女之间和妇女内部原有的强烈感情,如分享丰富的内心生活,结合起来反抗男性暴君,提供和接受物质支持和政治援助,那么我们就领悟了女性历史和女性心理的深邃含义”[16](P39)。可以看出,艾德里安娜·里奇将姐妹情谊扩展为女性之间的独特的情感纽带,而不仅仅是女同性恋者之间的情感联系。

当代著名女性主义学者埃莱娜·肖瓦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指出,“姐妹情谊是女性团结一致的感联系。女性被她们作为女儿、妻子和母亲的作用联系在一起。虽然这些联系并非一种活跃的、自觉的联合,却是一种内在的文化聚合。这种内在的文化聚合便是姐妹情谊产生的基础”[17](P22)。肖瓦尔特以女性的性别特质为出发点,强调了姐妹情谊的社会属性,即一种文化上的聚合和象征,并由此建构了姐妹情谊的理论出路。在《姐妹们的选择》中,肖瓦尔特重点阐释了“缝制百纳被”的美学意义。“缝制百纳被”这一现象起源于19世纪90年代的英国和非洲,凛冽的寒冬让缝制百纳被这一活动成为生活中的必要行为,并由此产生了“缝聚会”。这种缝聚会起到了“促进妇女之间情谊的作用,成了妇女们庆祝生日、订婚、悼念亲友、交流信息、学习新技巧甚至讨论政治问题的场合”[17](P54)。肖瓦尔特用“百纳被”的意象来隐喻女性之间的隐秘和合作关系,论述了姐妹情谊对女性传统建构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使其成为美国女性文化史的重要主线。

由此可见,“姐妹情谊”不仅是左翼女性文学的重要概念,还承载着更多女权主义的意义。女权主义所涉及的抗争、追求、自由、独立等使“姐妹情谊”成为具有丰富内涵的精神信息与力量源泉和改变女性群体被边缘化状态的良方。以姐妹情谊建构的女性乌托邦是一种情感上的依托,在这里,她们的声音得到了回应,她们的诉求得到了满足,同时政治觉醒的意识也慢慢灌输至女性群体的头脑中。从某种程度来说,旧左翼时期,以姐妹情谊建构的女性乌托邦成为妇女解放的一条出路,她们试图在书写女性成长的过程中增强女性的自我意识与建构女性的主体身份。

三、乌托邦的困境:对“姐妹情谊”的理性思考

姐妹情谊的力量赋予了女性群体前行的勇气,在这个理想的女儿国中,女人们不断地求索一条属于自己的光明大道。然而,依赖姐妹情谊所缔结的女性乌托邦可以真正成为女性实现自我解放的有效途径吗?《姑娘》这部小说在姑娘们参与街头游行与迎接新生命的诞生中戛然而止,“姑娘们”之后的命运如何?新生命是否可以避免母亲们的悲剧?我们在小说中找不到答案,在现实生活中却有不少作家和学者给出了阐释和回应。

玛丽·麦卡锡是一位独具一格的美国左翼女作家,与汉娜·阿伦特、苏珊·桑塔格一起被誉为现代西方最重要的女性知识分子。其196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她们》的女主人公是8位瓦萨学院的女毕业生,以7个女孩参加她们的8人组核心成员——凯的婚礼开始,最后以7年后再度重聚在凯的葬礼上来收尾。小说记录了她们从1933年到1940年间的生活轨迹,为我们铺展了这一时代知识女性的生活图景。毕业于瓦萨学院的女孩子们有优秀的教育背景,也有对未来的规划和思考。但在生活面前,每个人都面临着不同的困扰,同样要面对性别歧视、流产、生育、抚养子女、经济困难、家庭危机和性关系中的压抑等问题。相对于无产阶级妇女而言,她们面临更多的是精神的挫折和自我的丧失。“她们”的遭遇就是当时知识女性的真实生活写照,作品引起了许多女性的共鸣,使得这部小说能长期占据畅销书的榜单。“她们的困惑源于她们激进的理念与现实生活及个性的格格不入;如果不是那么标新立异,她们也许可以成为更好更快乐的一群人”[18](P36)。这群少女的不幸是个例,也是整个社会的映射,麦卡锡用尖锐的眼光审视着社会中女性的困境和不安。与《姑娘》中抱团取暖的姐妹情谊不同的是,该小说的姐妹情谊更多的是一种相互排斥又彼此窥视的复杂感情。她们渴望独立以及追求个性的诉求,成为了新左翼时期姐妹情谊的新向标。

《她们》为我们提供了审视女性乌托邦的不同向度,表达了新左翼运动时期左翼女作家对作为解放手段的姐妹情谊这一共同体的理性思考。在妇女解放运动、反文化运动盛行的背景下,在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妇女问题不再局限于话语权利和平等权利的追求,女性体验、爱情追寻以及婚姻问题等得到更多表现。此时以姐妹情谊建构的女性乌托邦不再具有宿命论的意味,更多的是充当了一种临时性精神慰藉场域,因需求而建构,因束缚而破灭,以致一些崇尚独立性的女性作家害怕聚合,而总在试图逃离这个怪圈,有意与女性作家这一标签和女权主义运动保持距离。

姐妹情谊也遭到了一些族裔作家的抨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黑人女性主义者胡克斯。她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专门探讨白人女性主义者所提

出的姐妹情谊,指出它不符合既定想象,认为白人女性主义者始终没有跨越种族的屏障,平等地对待黑人女性。胡克斯的质疑值得深思。

实际上,姐妹情谊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女性乌托邦是脆弱的、不彻底的、不牢靠的。乌托邦是“人们在饥饿乃至强制劳动中想起的一种愿望图像,它与主体所处的具体的现实处境是密切相关的”[19](P20)。这种动态、开放的处境赋予了乌托邦虚幻的色彩,更多的使其成为一种精神上的力量和支撑。就左翼女作家建构的女性乌托邦而言,经济条件的差别、受教育程度的不同,造成女性对社会活动的参与热情不同和对这一女性共同体的接受度不同。即便是在女性共同体内部,也有很大的差异性和分歧,也存在着阶级的、种族的、政治的等层面的不同,比如无产阶级妇女和中产阶级知识女性所关注的女性权力不同,黑人女性、少数族裔女性和白人妇女所面临的生存压力不同等,这些差异并不能和谐地共存在女性共同体这一集合体内。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时候,女作家与女作家之间、女性团体和团体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对峙、分裂和矛盾甚至显得更为突出。一方面,女性个体为了得到认可、实现个人价值而借助与女性团体的力量来发声,另一方

面,集体又在一定程度上束缚和压制了人的个性和价值,“要形成阵营及其力量,女性整体的同一性是必要的,而作为个体的人,又追求独特、独立和精神的丰富性。姐妹情谊就这样成为一个悖论”[14](P90)。这种悖论使女性共同体显现出两面性,只有在面对来自外界的尤其是来自男权社会的威胁和侵害时,它才会团结一致,有效地发挥其作用。

四、结论

姐妹情谊是女性乌托邦建构的感情基础,也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成为女性必要的精神寄托。女性乌托邦是美国左翼女作家建构的精神乐园,表达了以此来抵抗阶级和性别压迫的宏大构想,也体现了她们在女性集体中确立个人自我身份的努力。作为一种政治实践,以姐妹情谊为纽带缔结的女性乌托邦不可避免地具有脆弱性、短暂性和不确定性,虽然它能够在思想与精神上形成对男权主义的一种抵抗力量,却无法给女性成长指出一条现实可行的路径,因而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沦为脱离实际的空想。然而,作为一种理论构想,姐妹情谊仍然在新时期的语境下持续发挥着作用,它既是对西方女性主义者建构“女性共同体”理念的呼应,也符合西方女性“历史性成长”的精神。

参 考 文 献

- [1] 张莉. 美国的左翼女性文学的共同体书写[J]. 当代外国文学, 2018, (4).
- [2] 王予霞. 20世纪美国左翼文学思潮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 [3] 杨玲. 隐秘的和谐: 论西班牙当代女作家马约拉尔[J]. 外国文学研究, 2011, (3).
- [4] 徐雅宁. 《过春天》: 女性成长的书写与女性书写的成长[J]. 电影新作, 2019, (5).
- [5] Coiner, C. Better Red: The Writing and Resistance of Tillie Olsen and Meridel Le Sueur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6] 高小弘. “女性成长小说”概念的清理与界定[J].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1, (2).
- [7] Bartkowski, Frances. Reading the Romantic Heroine: Text, History, Ideology by Leslie Rabine [J].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989, (4).
- [8] 斐迪南·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M]. 林荣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9] Le Sueur, Meridel. The Girl [M]. MA: West End Press, 1978.
- [10] 芮渝萍. 美国成长小说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 [11] 龚自强. 姐妹情谊与男权世界的辩证——简论电影《七月与安生》[J]. 艺术评论, 2011, (11).
- [12] 魏天真. “姐妹情谊”如何可能? [J]. 读书, 2003, (6).
- [13] Humm, Maggie. The Dictionary of Feminist Theory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3.
- [14] 王政. 女性的崛起: 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5.
- [15] 康正果. 女权主义与文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 [16] 玛丽·伊格尔顿. 女权主义文学理论[M]. 胡敏, 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9.
- [17] 程锡麟. 肖沃尔特与《姐妹的选择》[J]. 外国文学, 1998, (5).
- [18] Stock, Irvin. Mary McCarthy [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68.
- [19] 金寿铁. 令人向往的愿景——恩斯特·布洛赫作品中乌托邦概念的功能与作用[J]. 社会科学战线, 2020, (5).

(责任编辑 乔学杰)